

集舞門雲
流浪者計畫

第三屆
獲獎助者旅行採訪實錄

第三屆「流浪者計畫」八位流浪者的旅行故事，
委請專任採訪者鄒之牧女士
第一屆流浪者王瑋廉，以及本屆流浪者盧健英、廖博弘撰寫

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口袋
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踽踽青空下
繆思 我效忠您 韓波《我的流浪》



第三屆流浪者易君珊/設計

從旅程帶回生命的寶石 影像創作者——楊士毅

文／鄒之牧

二十七歲的楊士毅，還在唸台藝大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影像創作四年級，歷年的創作量卻已驚人：有黑白、彩色攝影，靜止畫面充滿了強烈的張力與戲劇感；有各式的繪畫，含水墨、電腦上色、素描、版畫…他還寫詩，寫劇本，拍攝短片，去年且入圍金馬獎。大學以來，作品早已南征北討，獲獎無數。



太陽樹／楊士毅繪

他還試著將自己的一筆連畫胖胖人素描連成動畫，也將人物造形捏成泥塑研究肌理表現。這回，則是要去大陸學習陝西的剪紙！為什麼談楊士毅的旅程要先提到這麼多他的創作呢？因為創作早已深入到他每分每秒的思考裡去了！第一次踏上大陸這片土地，這位旅人最在意的不是風光，而是人。人與他的創作思考、生命省思息息相關，這一切緊扣他思索的未來，也返回到他生命的最初源頭！

不再只看自己 成為領受大自然的「翻譯員」

楊士毅出身勞工家庭，創作初始，是為了宣洩心底的憂鬱。小時候因為家庭因素，六歲前與祖母同住，之後雖與家人團聚，卻因寄居親戚家，母親反而管得更嚴，使得楊士毅更顯沉默、憤懣。他大學時的一個黑白攝影作品，有著令人震驚的沮喪和絕望——小孩在封閉的廢墟裡貼著骯髒的玻璃窗凝視鏡頭，天真的臉龐顯得扭曲不被瞭解。大學時因為：「沒自信，又想作些不一樣的事！」他當了素描課的人體模特兒，對身體的認識加入創作因此成了新的元素，與弟弟在空寂的公共空間裡裸身躍起的攝影系列讓他贏得了國藝會的贊助，對一個在校生而言這是非常難得的殊榮，但此時的他內心仍然非常孤單，「好痛苦！」

一個偶然的機會，拉拉山奇異的大自然力量驀地開啟了他的心靈。

他發現「沒人看卻也開得好美」的植物，以最不起眼的方式給了他最大的教訓：「原來全世界都在創作！」他一直以為自己是在創造「美」、追求「真理」，相形之下，卻映照出自己內心的黑暗與偽裝！他許下心願，要成為一名將這些從大自然得來的領受傳揚出去的「翻譯員」！這次選擇去陝西看已逝的剪紙名家「剪花大娘」庫淑蘭那偏僻的故鄉的旅程，也是基於這麼個動機。他敬佩人們可以如此帶著善良與祝福的心、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從大自然找尋能表達願望的元素。他畫了許多受當地啟發的年獸，有著許多同樣吉祥又諧音的動物或文字符號象徵，可是他一張紙也沒剪出來！他發現最難的是在「心意態度」，他無法畫出「穩定、純樸又純真」的作品，因為無法面對自己的「複雜與包裝」，而這一切，又是出於「缺乏自信」！

旅行就如人生的濃縮版、快速播放

初抵黃土高原，他想哭，因為放眼一片的枯黑景象！「老天到底要我來這裡作什麼啊？」可是這兒他遇上了一位年輕時曾行乞創作，而後借錢開展揚名江滬的民俗畫家王興科，向他展示以前從沒想過的人生態度！這位大叔自忖當年「連討飯都討得比別人好」！在楊士毅的日記本上寫下「貧窮是老天賜給我的財富，如果沒有貧窮的經歷，那就一事無成。貧窮是財富，是動力」，以及「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

在西安「話吧」裡，遇到好心的大嬸，收留他住宿，也讓楊士毅從陌生畏縮，到體認到只要勇敢地拿出熱情與感性，人與人間不信任的鴻溝是可以消彌的！在 Starbucks 咖啡館他每日寫日記整理思緒的地方，一位工作的小妹聽他敘述創作、交換心靈故事，兩人都激動到紅了眼眶…楊士毅對生命不間斷地探索，但藉著這一切與人的分享、傾聽，奧妙的答案其實已悄悄向他揭示。

旅程中其他相遇的人：遠途回鄉奔喪的、玩女人敗光家產的、被男友背叛欺騙的、甘心跟隨已婚男人的…這些「絕望與悲傷」故事，也給了楊士毅很多課題：「旅行就如人生的濃縮版、快速播放…」「分開後就再也無從得知對方的生命如何發展了。因此更不須要拘泥，更應該珍惜！」

旅途中接觸到的女性，也讓楊士毅更感動於女性的無私、奉獻。因為「無我」，所以必要時可以變得更堅韌、更適應各種的面貌。而黃土高原的剪紙、虎頭鞋等一剪一衲祝福滿盈的「母親的藝術」，也是一種無私心意的偉大。

美，應是出於分享

出發的第一天，楊士毅就想家了。他發現自己需要家庭與感情關係，與台灣的電話聯繫變得珍貴。他也發現自己「總是急於寫日記」，「沒辦法感受當下。」自己總是在「做做做」，有了小成績，又輕易地「驕傲」。以前他總是想著如何才能獨特，但這不是真的創作，在拍照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強烈的『選擇性、排他性』，而「真正的美，應是出於分享，出自於付出與服務」的心，最終，應就是「愛」！

他不想再帶著傷痛創作了！他鞭策自己去了奇險的華山，山的懷抱就像個長者，儼然不威嚇，「反令人感受到它背後安靜、謙虛、自在地承載萬物的那份態度。」在西藏，他爬了一個好久的山，以為、認定山頂的廟宇裡「有很重要的東西」在等著他，進去卻發現空無一物！給了他當頭棒喝。路上荊棘的植物帶刺、長得醜惡，卻「滿足於自己的樣子」；銀杏的葉子不管有沒人欣賞，卻自我完成了完美的造形！這一切的「了悟」令他又驕傲起來，但朝聖者一身的襤褸眼神卻澄澈篤定又令他自卑。整個旅程，他便是這樣反覆於對自己的充氣與擊打中，以致「疲勞爆發」！

回到台灣之後，他一個多月什麼事都不能作也不想作，讓自己放空、不與任何人接觸。一個多月之後，楊士毅拾起畫筆，畫面中，盡是鳥、果實、寶石、光芒、與太陽樹。全是自然發想出來的！油漆筆濃厚的亮彩，讓小小的畫幅卻透露出豐沛的能量！

問他，這些領悟回來之後會不會隨著生活慢慢又消失了？他很快地答道：「不會，因為『有媽媽』」，語調勇敢！母親是他學習堅忍與在生活洪流中不喪失方向的座標。這次旅程，更加肯定了這個信念！入圍的影片「爸爸的手指頭」，也是他企圖修補與傳統拘謹的父親多年距離的投射。「『愛』是唯一的出口，唯一值得人們用一生去追尋、創造，與表現的東西」，這句寫在楊士毅某日旅行日記中的話得來不易，出自顛沛，因之更加珍貴，真實！

直到路的盡頭 單車穿越歐亞的張子午

文／王瑋廉

「我仍一如往常，充滿了動力上路。」星期天的下午，在教會的禮拜堂，在聽完子午與家族、朋友的旅行分享之後，子午的媽媽唸出兒子當時寄回家的明信片內容。那是，人在西班牙的張子午，丟了相機、日記，以及存放著近四個月旅行照片的硬碟的時候。



戈壁灘艱難前進／張子午提供

二〇〇七年六月底，這個年輕人正要用雙腳踩踏自行車，預計花半年的時間，從中國西安一路滾動到歐亞大陸的最西端——葡萄牙羅卡角。這項行動是他宣示對古代旅者的憧憬與致敬，就像當年玄奘的足跡，馬可波羅的遊歷。

退得了學，退不了對單車的執著

子午旅行的啟蒙是在高二那年。那時候中國還探親才剛開放，連做生意的台商也才剛剛起步，但是，這位少年冒險家，便和他班上一位同學結伴前往中國大陸，決心將自己的雙腳踏在只在教科書上讀過的地方。兩個星期的大陸行，不僅滿足了少年子午對中國的想像，對未知的探索，更確立了他日後旅行的精神。高三畢業的暑假，他又前往雲南一個月，獨自深入最南部傣族自治州的西雙版納。兩年後，又隻身赴印度旅行。

從一九九八年，大一被退學那年開始，子午幾乎每年都會進行一次單車環島。十年前，在騎單車還沒有成為全民運動風潮之前，在全台灣還沒有所謂「單車步道」的時候，子午就牽著自己的破腳踏車，將行李捆在後座，罩上黑色大塑膠袋，就去環島。從台北出發，向東海岸挺進，十九歲的少年帶著被退學的挫敗心情上路，卻在極度的勞累中獲得情緒的舒張、壓力的釋放，自此，單車環島成為他每年必做的事。

不斷前行，直到天地荒野

跟隨古代旅者的行腳、陌生地域的探索、騎腳踏車：三者相加就是張子午的流浪者計畫。這其中沒有一項是偶發的想法、刻意的編派，會走這一趟，是心之所向。

路程是這樣的：從古絲路的起點西安開始，經過河西走廊、新疆、到烏魯木齊，進入古代突厥游牧的國度，現今的獨立國協哈薩克，再一路向北入俄羅斯，順著全世界最長的內流河伏爾加河，沿黑海濱到索企，坐船至歐亞交界的土耳其。接著一路向西，進入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希臘，再繞過地中海到義大利、西班牙，最後進入葡萄牙，逼近整個歐亞大陸的最西端。亞洲三個月，歐洲三個月。

開始的時候，他每天都在趕路，深怕不掌控進度就無法完成計畫。從西安到烏魯木齊，從新疆到哈薩克，世界越走越大，直到周遭的人說著自己再也聽不懂的話；直到身置荒野，天地僅存一人。

在前輪、後輪起踏間，貫連了這片大陸

在哈薩克的烏拉爾，歐亞交界處，子午等待著俄羅斯的簽證生效，卻剛巧碰上了馬戲團的表演；在邊境的小鎮，因為帳棚無法搭起，索性睡在曠野廢棄加油站的廊沿下，伴滿天繁星入眠。從一個邊境到另一個邊境，從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於是，在前輪與後輪間、腳起與腳落間，他用他的單車貫連了這片大陸。

到達西班牙巴塞隆納，已經是旅程的第四個月。子午騎著車找了一個晚上，都尋覓不到住處，在城市裡紮營，則過於危險。於是他決定到巴士站隨便買張票，好離開這無處容身的港都。Vigo 這個名字被他選中。想說就漂流這個鄰近的小鎮去吧！殊不知，巴塞隆納在東岸，Vigo 在西岸，這一趟夜車，將橫過整個伊比利亞半島。子午坐在咖啡廳裡等候上車，想著這一夜，就要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邁向旅程的終點。放鬆之際，一轉身，卻發現身邊的背包不翼而飛，那一路行來的日記、攝影、點點滴滴，全都沒了。一時還來不及反應，通往西岸的夜車也即將啟程。就這樣，旅者在抵達前，散失了他所有的經卷，但仍繼續上路。

「全都丟了，剩下的，是心中最深刻的記憶。」回台後的子午，已經有了出書計畫。六個月的行進，一萬五千公里的旅程，上百座的城市，他要把這些記憶串連起來，就像用單車貫連歐亞大陸，就像古代旅者以自己，緩緩地將世界接續起來。

越南的《如夢令》 魚果的流浪詞曲

文／王瑋廉

「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在旅途中的某一天早晨醒來，恍惚之間，突然完全聽懂了原本陌生的語言。」



我的籌歌老師／魚果提供

陳俊豪，大家都叫他「魚果」。在訴說自己這一趟越南、柬埔寨之旅的時候，彷彿描述的不是異國，而是他的家鄉，你甚至能從他的話語中嗅見一方水土的味道。當他娓娓吟唱著越南「籌歌」（Ca Tru），振動著顎口與喉頭，召喚起聽者心中的，竟是灰藍煙綠的中南半島。我開始願意相信，每個旅者都有一處屬於他的原鄉，不僅僅是所謂「心靈上」的原鄉，而他真的像是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魚果再次「回」越南。

時間拉回二〇〇五年六月，魚果前往澳洲，在中途轉機時「遇見」了越南。越南歌謠、器樂與語音的柔軟流轉，讓他覺得他的目的地應該是在這裡。事隔一年，他為自己準備了「短短的」兩個月，赴越南，隨當地老師學習傳統歌謠的吟唱技巧，並撿拾也許在很久以前就已然埋在心靈深處的記憶。

自小，魚果就喜好閱讀，家裡開的是漫畫店，卻喜讀唐詩。他愛白樸、李賀、梁武帝，乃至與友人成立「李清照私人劇團」，為《曹七巧》、《白素貞》等新戲填詞、譜曲。不管是在馬路上，或在馬桶上，只要靈感一來，他就用手機錄下自己哼唱的調子。由此可見，越南籌歌老師口傳心授的教導方式，真的再適合他不過了。

一個月只學一首歌

籌歌，又稱「陶娘歌」，溯至中國中唐時期，一種由藝妓表演的曲藝，以唐宋詩賦入詞，以帶琴、拍板、小鼓伴奏。唱腔溫雅婉約，情斂意滿。由於越南籌歌唱的是「漢越文」，發的是越南語的古音，因此少人學習，業已沒落。魚果說：「跟台灣一樣！越南滿街都是周杰倫，要買一張『籌歌』的CD，得搭很久的車才找得到」。古調的保存都是法國和美國人在做。他跟一位越南的年輕人說：「你們再不學，以後就要來台灣跟我學了！」

魚果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只學一首籌歌。

越南籌歌重「閤口音」一極不容易發的閉口弱音，且共鳴腔在鼻腔、顎間、喉嚨、胸腔及腦後間轉換。「我要學的是發聲技巧，而不是成為一個籌歌演唱家。」儘管如此，但要在一個月內學會這些技巧，用極其陌生的漢越古音來吟唱，也是非常困難的事。但魚果說：「對我來講還好。難雖難，也還跟得上。」原來，他以前就聽CD自學吐瓦地區的泛音發聲，演《白素貞》時，也是聽CD學日本歌舞伎的唱腔。

頹傾間的甘甜和體諒

隨著魚果哼出的各種腔調，旅行繼續上了越南北境的諒山、西北的沙巴、以及柬埔寨的金邊。瀏覽筆記型電腦中的照片時，他特別佇留在其中一張：一間內部頹傾的屋子，堆滿了廢棄物，彷彿遭遇了大災難，一尊佛像，也歪斜其中。光從窗洞外透進，悠悠地顯影。佛像的頭半部全毀，像是破了個大洞，卻依舊慈容滿面。「這就是我心中的柬埔寨」，他看著照片說，「我總是會將目光放在那些破爛的景象上。」

他說的「破爛」，我想是指那破爛中的「美」吧。魚果喜歡「綠肥紅瘦」、「簾捲西風」的李清照，深愛《楚辭》有自己俗豔排場的山鬼；他拍攝一系列越共處死戰犯的照片，一張張，都是注視、直擊下的屍體、肉塊。他說他在「尋找黑暗中的那一點甘甜，和體諒」。

二〇〇三年歐洲之旅，魚果創作了《曹七巧》的詞曲，二〇〇五年泰國、柬埔寨之行，他寫了《白素貞》。這次，魚果完成新戲《淫奔》的詞曲十首，並於回國後演出，節目單上寫：「《淫奔》十式架構是魚果在流浪越南點滴重病中完成的，八十四字，字字血淚。」看來，這位時常讓自己流浪在外的創作者，把世界都一一納入了他的〈如夢令〉中。

我問他：「你為什麼叫『魚果』？」。

他笑著說：「你不覺得，一種『是魚的水果』，看起來就腥腥臭臭的嗎？」

我略略點頭。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的…」他說。

尋找指南針的旅程

盧健英訪問盧健英

2006年，盧健英辭去兩廳院的媒體工作，原本忙碌的生涯突然像被戳破的汽球般，現出了原型：情感無歸處的空洞，生涯轉型的瓶頸、經濟不穩定的焦慮。

她崇拜所有流浪計畫裡充滿「壯遊」勇氣與體力的年輕人。但一開始申請流浪計畫時，心裡想的從來不是「壯遊」，卻是「工作」。「進行社會觀察，特別是對劇變中的中國的觀察。」她的最初計畫是走訪中國的主要城市，因為在那之前，幾次到北京、上海的出差經驗，中國人對未來美好、正向的樂觀態度，振振有辭得令人難以置信。她在面試時也準備了振振有辭的說法，但「沒想到，林老師卻只叫我「放空」，以及，「也到農村裡去看看吧！」

出發前，緊張了。她在出發後的日記裡寫著：「中年都會女子的旅行，談不上壯遊了，因為不知不覺裡就在旅行中加了許多防護網，連衛生棉都要帶自己熟悉的牌子，你就知道，「不喜改變」，「好逸惡勞」，「遠離匱乏」這些「保險為上」的概念是如何像身上的油脂揮之不去。」哪裡有西蒙波娃去美國旅行前，那般懷抱著「生命即將出現大事」的積極與銳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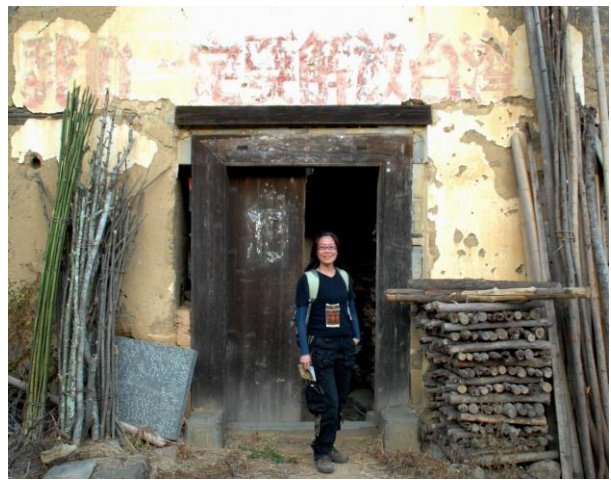
相較於她的一群要好的姐妹朋友們，盧健英形容自己是「生活裡最沒有指南針的一位」，沒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沒有需要準時接送的孩子、沒有需要應對的公婆、更沒有朝思暮唸的（碎碎唸）另一半，她們奔波在各種角色之間，去分配二十四小時，「而我的人生，根本就是這些忙碌的職業女性們最想給自己的獎賞」。

清晨開往機場的巴士上，她挖苦自己，這根本是一個「放空」的人生，還需要放空什麼？中年卻說不清楚自己生命的根據地，人生的大自由反而倒像是一種帶刺的桂冠，表面上無限可能，內心裡卻隱隱有著沒有指南針的焦慮。

崛起的中國，像一個腎上腺激素不斷爆昇的國家，出發半年前，盧健英開始將旅行目標集中在雲南，中國的西南邊陲，消失的地平線，香格里拉，傳說中的絕美天然與充滿少數民族色彩的雲南，同時也是中國列為三大觀光開發地的雲南。

長途在外的旅行，她終於體會了西蒙波娃所說的，覺得旅行中的自己宛如鬼魂，在不能落腳的城市裡飄移。

行程從雲南麗江開始。往上行到中甸，往下行到大理、昆明，從昆明之後再轉往大城市。她到中國旅行，但卻發現，整個中國都是在「旅行」的人，中國太大了，在麗江，聽到各種口音，大部分的人都只想在麗江「待一陣子就走」，這些從北方都市來的旅人們，說為了麗江的秀麗而來，但「太多的外來鬼魂」，卻把麗江納西文化的生活秩序搞得不復往日。這些「旅行」為了非常現實的目的：炒市、賺錢。古城裡的樓價在過去五年裡，不是漲五倍，是漲五十倍。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盧健英提供

「我覺得很有趣，大部分的人對貧窮的認知是差不多的，但對於『富有』的定義，就變得很懸殊。」對於迅速富有的中國，盧健英在旅途上，以隨機的方式，進行了關於「富有」的訪談。

在寶山遇到的小和，覺得如果存款到了七萬元左右，「就夠有錢了，然後娶個老婆，不再去福建打工。」三十歲的小潘，在成都開成衣店，「成都的女孩嬌貴時髦，如果要能夠讓她們覺得『夠』，至少得要個一百萬左右吧。」虎跳峽遇到來自武漢的小王，三十一歲，獨立自主的職業女性，與新婚的老公約定，每年各別去做自己的自助旅行，在麗江喧鬧的酒吧裡，她告訴我她的經濟不虞，大部分投入在股票市場裡。「成果還不錯哩。」

中國正在崛起，在中甸，市區裡釘釘鑼鑼蓋新樓，寬闊的街道上矗立著嵌著黑色藏族邊飾的新樓房，懸在空中的油漆工人小心翼翼地移動他們的工作位置。藏族人的哲學裡向來不與天爭高，「轉山的道理就在於此，一圈一圈盤旋而上，而不是垂直而上挑戰高度的登山。這樣的高樓出現在中甸是我不能理解的。」她說。

最「富有」的人是留在故鄉的人。在中甸的一家乳酪店裡，吃了一頓一個月來最昂貴早餐，兩片烤吐司加蘋果以及店內獨售的牦牛乳酪，二十五元人民幣。但卻因此在聊天中，循線認識了七珠先生。

七珠是前任藏族自治州的文化局長，退休之後成為由香港探險家黃效文成立的中國探險協會，擔任在中甸總部的總幹事。盧健英更有興趣的是他的牦牛農場。

牦牛是藏人最重要的財富來源，千百年來藏人將牦牛奶做成傳統的奶渣和酥油茶，在高海拔的山區裡提供充足的熱量。七珠的太太在四川和雲南邊境上的浪都山區裡有間農場，浪都有多遠呢？「從香格里拉到浪都大約有一百一十公里，中間必須跨越三座雪山，這裡到了2007年才終於有了電力。」公車只到縣城，一天一班，農場每年工作的時間只有九個月，到了十月冰雪封山，農場只留一人看守。

為了讓牦牛奶具有更高的生產價值，幾年前，在黃效文協助募款的支持下，七珠的農場邀請了美國乳酪專家引進新的乳酪技術，再由香港的一家社會創投公司負責在中國及香港的行銷。盧健英在店裡吃到的乳酪正是他們學會的第一批西式乳酪，兩個月前才在北京開過品嚐記者會的「雅格乳酪」。中甸古城區裡的美香乳酪店是上個月才開張的「旗艦店」，店裡只有四張桌子。顧店的是七珠的弟媳，天冷，客人不多，她總是坐在牛奶罐做成的小火盆前邊烤火邊打毛線，看我吃著她做好的乳酪早餐，她很小心地問：「這樣真的好吃嗎？」

店裡乳酪的價格幾乎和台北超市裡的進口乳酪價格一樣，一磅190-210元左右。「我問七珠，為什麼你敢？他說，因為夠好。」牦牛長在海拔三千多公尺以上的山上，牠的脂肪、高鈣與蛋白質都是一般乳品的一倍。

但這無法解答盧健英的疑問，因為光是路途遙的交通成本就很高，難道不能把農場搬到近一點兒的地方？「我做好吃的乳酪，是為了讓整個村子都能改善生活。如果搬走了，就不是初衷了。」七珠說，奶酪廠逐漸可以規模化生產，現在正在進行衛生檢驗的認證，這裡面最大的困難還是在距離遙遠，生鮮運送的保存，但「在做乳酪之前，農場每年的收入大約只能有四萬多人民幣，今年應該可以到十二萬人民幣了。」七珠在他原本貧瘠的故鄉土地上，看到了未來的財富。

五十餘歲的七珠曾跟隨雲南歌舞團到過台灣，對他而言，新的生涯正開始，而新工作挑戰過去所有的習慣與傳統的認知。除了酸奶渣外，他並不很清楚什麼是「好吃」的乳酪，只是透過品嚐者的微笑得到辛苦的肯定。為了募款，他努力知道「有錢人的生活型態」，去的那一天，他正忙於下個星期即將從香港來的「大腕團」的接待工作，他帶盧健英到開車四小時才到的金沙江邊的傈僳族村寨，檢查傳統建築裡全新安裝的坐式馬桶，衛浴設備及熱水系統。「我注意到冰箱裡還放了充足的可樂。」這個村子裡現在只剩居民數十人，他們多半一年裡洗澡的次數是不多的。而這些大腕這回只來三天。

三個月的旅途，最大的收穫是什麼？「體力，原來自己的體力過去一向被自己低估了。」盧健英說：其實，一個人的旅行，最常遇見的是自己，「你以為那麼簡單的日子，你一定過不下去，那麼遙遠的路你一定走不完，但一路上，好像真的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易君珊的「流淚者計畫」

文／王瑋廉

別人一隻手有五根手指頭，她一隻手，兩根，一隻腳，也是兩根。別人在平凡的生活裡追求不凡，她在「不凡」的身體上，力爭平凡；別人出國流浪，離開家到遠方，她回國。不！她回家。「不！」易君珊說：「從台灣到美國，從美國到台灣，我始終找不到家的感覺，我還在流浪。」



君珊的台灣行腳／易君珊提供

反凝視的戰場

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異樣眼光和特殊待遇，讓國中畢業後的易君珊，選擇離開台灣，隻身一人到美國念高中。在美國，平等對待的教育環境，讓她重新構築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兩種社會觀念差異的成長經驗，也使她意識到身體可以被重新定義，歧視可以藉由觀念的改變而降低。因此，她進入芝加哥藝術學院，取得碩士學位，進入了藝術治療的領域。

易君珊，Sandie，按著筆記型電腦，給我看她在學校的作品。一幀幀呈現不同觀看角度的相片，建構一系列自己在醫院裡診療過程的記錄。她說作品的創作緣起，來自於童年時期被他人凝視的恐懼經驗，也展現她對「物化身體」的批判。

二〇〇六年，在芝加哥作藝術治療師的 Sandie，接到媽媽傳來的「雲門流浪者計畫」訊息。原本她打算前往中國大陸，到育幼院尋訪跟她一樣身體不凡的孩童，付出她關懷與愛的能量，但是在面試的時候，林懷民老師一句：「為什麼妳不回台灣做這件事情呢？」於是易君珊更變行程，「流浪者計畫」破例「在台流浪」。

Sandie 說：「回來台灣，是帶著一些怒意的」。從她所敘述的成長經驗，以及對社會的質疑與期待，複雜的情感中，或許正顯示——台灣，才是她「凝視／反凝視」批判的真正戰場。

台灣的行腳

Sandie 的計畫是：訪視台灣與她相似，有著不凡身體的大人與小孩。這些人散居各處，隱而不顯，要找到他們並不容易。因此，她從自己家族裡新生的小堂妹開始，一個和她有著相同基因的二指寶寶。之後，她便一步步向台灣中南部移動，並在訪視過程期間，藉著口耳相告，又會得知新的訪視對象。兩個月的旅程，她步跡台灣西部十多個點，還在澎湖，與一位先天沒有雙臂的男童相見。

幾乎三兩天就得移動到下一個地點，在每一個定點，Sandie 都以最大的心力與訪視對象溝通。這些受訪者從嬰兒、孩童、學生、到社會人士都有，她也不斷地轉換在觀察者、教育者、客人、實習褓母、甚至社會運動者等身分之間。台灣社會對於身體障礙者的歧視與壓抑，讓 Sandie 很難跨越觀念上的障礙，與受訪者對談更深入的話題，就像對不上的齒輪，只能一直在原地空轉。於是，Sandie 累了，在缺乏獨處空間的喘息之下，她說：「我覺得我一直在漏油，一直在消耗能量，我覺得我好像被掏空了。」

坐在台中科博館外的椅子上，Sandie 打電話給在美國的室友。一聽到室友熟悉的聲音，心中無可遏止的疲倦與悲傷瞬時湧上，就在路旁邊講邊大哭了起來。她說：人家都是「流浪者計畫」，可她的是「流淚者計畫」。

落盡眼淚，Sandie 走進科博館。大廳裡一隻仿造真實大小的暴龍矗立，巨大的頭露出森白的尖牙，像是正要向你撲來。她望著暴龍，愕然發現，龐大暴龍的身軀，有著短短的兩隻手，而那雙手，竟有著和她一模一樣的二指。館中展覽著生命進化的歷程，在各項陳設旁邊，都有說明演化的告示，分析優生與絕種的原因。Sandie 看著暴龍的手，想著該如何找出自己身體的文化，不被「消滅」。

在「流浪者計畫」之後，Sandie 仍有十多個對象要持續訪視，一切像是一個開始。在走完一趟「流淚計畫」後掏空自己的易君珊說：「藝術治療的概念是在為生命做見證，是在品嚐生命。」她眨動著瑩亮的雙眼。「當我抱起和我一樣有著特殊身體的小朋友，當我們在彼此懷裡的時候，我感覺到一種滿足，就好像只有在擁抱的時刻，我們才能確立彼此的存在。」

阿康的鄉愁

在拉薩停留的鏡頭

文／王瑋廉

第一次見到阿康，是他結束五個月旅程後的一陣子。九月台北悶熱，卻見此人胸前掛著單眼相機，肩上背著鼓脹的旅行包，像是仍在流浪的模樣。「不重嗎？」我問他。他說，「這樣，能讓自己平衡一點。」

入藏前的腳步

名義上，這位流浪者的計畫是攝影，從雲南入藏，收拾行路風光；實際上，他只想什麼都不做，好讓自己的生命休息一下。「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這話從總是垂著頭、凝著神、因千思萬緒而一語不發的阿康嘴中說出，重點似乎仍是「任重而道遠」。

阿康，江志康，在苦悶的高中時期開始接觸攝影，愛上了這種表達方式，直到大學考進了企管系，一度放下手中的相機。但最終他發現，鏡頭下蘊藉的自覺與批判，才是自己所看重的價值。因此，他再拿起相機，傾聽這世間的回音。

二〇〇七年四月三日，阿康啟程到雲南大理，開始他的「放空」之旅。放空，是為了要拋除知識所建構出的習性，找回生活感受，「不設定計畫，讓意外發生」是阿康出發前的想法。於是從大理到麗江，從中甸（香格里拉）到浪都，就在從浪都返回中甸的途中，因小包車的車輪打滑，差點送命，在地平線上消失。險中得生，讓原本對路況膽顫心驚的他，反而放下了憂慮，也才發現，原來眼前的風景竟是如此美好。

進藏後的行路

從中甸再向西北，阿康花了五天五夜翻山越嶺的車程。五月二日，抵達拉薩。而這位流浪者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在這個海拔三千六百五十公尺，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日光之城，一待近四個月。每天，阿康就在城區裡遊走，上大昭寺，繞轉經路。

西元六四一年，中國唐朝的文成公主遠嫁吐蕃王朝，將佛教帶入西藏，進而造就出整個神秘而輝煌的藏傳佛教文化，大昭寺便是第一座佛寺。日日夜夜，藏族人長跪於寺前早已磨得光滑的石磚上，合掌於額，再置於心，接著向前俯臥，五體投地，大禮著寺內他們世世代代共有的佛。以大昭寺為圓心，朝朝暮暮，藏族人手持轉經輪，腳踩轉經路，一圈一圈在八角街上順時而走，低喃口中的經咒，無盡地向佛祝禱。每一聲祝禱，都只為他人祈福。

阿康走在八角街上，坐在大昭寺前，甚至在門廊下，與藏民共眠。對他而言，在拉薩最深的體會，並不是世界屋脊的壯麗，也不是世界遺產的痕跡，卻是民族和民族之間，在政治操控與歷史底蘊中，最糾結複雜的衝突。



布達拉宮廣場前的喇嘛／江志康攝

漢藏間的衝突

上天給了藏民族最艱苦的地理環境，宗教卻將這個民族帶入最純粹的心靈境地，然而政治呢？一九五一年，中共「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年後，還在西藏政教中心，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布達拉宮前，兀自豎起一根擎天大柱——「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碑前用大紅花排出「祖國萬歲」四個大字，鮮亮亮地展示著權力的傲慢，以及藏民族的屈辱。一次在拉薩江蘇路上小小的車禍，就讓阿康看見隱埋在和平表象下的漢藏衝突。

一個漢人騎著摩托車，從後撞上藏人駕駛的小貨車，摩托車無事，小貨車的後車燈卻破了一塊。雙方在路上爭執，圍觀的人群你一言我一語地指責那名漢人，貨車司機更提出高價的金額要對方賠償，但騎摩托車的漢人不認為自己有錯，不願拿錢。接著，開始有圍觀的人動手推擠那漢人，而藏族的公安，也只是袖手旁觀。最後，漢人付了一百五十塊人民幣才得以離開。但就在此刻，卻又跳出了一名藏族青年怒罵公安，說他不主持公道，幫著漢人，是中共的走狗。話還沒說完，圍觀的藏人立刻將這名青年拉走，怕他遭到不測。

「現在的西藏，就像過去的台灣。當年的『白色恐怖』，正在西藏漫佈。」在極權宰制下的西藏民族，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也是經濟上的被壓榨者。中共有計畫地移民西藏、開發西藏，要以繁榮富裕的標語，將西藏吞滅。達賴喇嘛是禁忌，民族意識是重罪，自由思想是不可能。

回台後的阿康，一面用相機持續「報導攝影」的工作，一面用攝影機，捕捉台灣當前持續翻騰的政治與社會事件，他試著要把台灣與西藏，在影像上勾連出一個互映的面貌。一雙從台灣出發，停留西藏，轉回台灣的眼，阿康說他「回不來」，他是回到台灣仍繼續流浪的流浪者。因為這份鄉愁，又豈止是在來去之間。

等待拍片 游昌樺的北漂行旅

文／王瑋廉

「人總會走向他所想去的地方」，昌樺並不是自信滿滿地說出這句話，他就像現今台灣大多數的年輕人一樣，對未來沒有過多的企圖心，也沒有失望，只是等待。



我的北漂之旅／游昌樺提供

國中的他努力用功，卻考上了一個不盡人意的高中，於是他告訴自己，縱然付出再多，最後也都是聽天由命。因此他決定高中三年當個不讀書的學生，成天鬧事混日子，打架整老師，結果卻考上東華大學中文系。命運似乎在告訴他凡事不需要太多計畫，所以在報考研究所前的一個半月，這位老兄才打開書本唸書，事實顯示，他一舉考上了南藝音像紀錄所、清華人類所、東華族群關係與文化所。「我覺得自己一路都很順遂」。他說會選擇南藝，是因為想要創作，想要藉由紀錄片的形式，介入拍攝的事件，創造觀看的角度。

介入事件，並不是紀錄片「應該」發生的事，但對於昌樺而言，拍攝本身就是介入。「任何影片都可以說是紀錄片」。他對紀錄影像有自己的想法，他還在辯證真實，也身陷思索的困境。「我是在速食店裡翻《遠見》雜誌，看到了雲門流浪者的訊息」。昌樺想給自己挑戰，決意「自我流放」。問他為什麼選擇新疆？他說，「因為二〇〇六年曾去過一次，因為地理人文全然不一樣，因為有許多浪漫的想像。」

在北疆等拍片

計畫去吐魯番找上一趟旅程認識的朋友，準備拍攝他們家葡萄釀酒的過程，要從一顆葡萄，看人在勞動生活中的本質。然而這些「學術計畫」，果然不敵「命運變化」。昌樺興沖沖地奔向葡萄之鄉吐魯番，誰知道朋友家中剛好遇到長輩過世，不便打擾，偉大的田野計畫，轉眼成空。

頓無所依的他，從吐魯番往西到伊犁，再往東回到烏魯木齊，整整用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坐小包車，每天走四、五小時的路，把整個北疆走透透，一面遊歷，一面希望能夠找到合適拍攝的題材，但皆無所獲，連在那著名的新疆姑娘所在地「達板城」拍攝的帶子，都因為自己的不注意而全數丟失。沮喪之餘，一事無成之餘，昌樺拖著疲憊的步伐，離開北疆，前往不在計畫之內的北京投靠朋友，轉轉運。

在北京等片拍片

在北京電影學院的朋友正好要拍短片，反正是等不到題材可拍的昌樺，索性幫朋友辦演員試鏡。無心插柳，讓他遇到了好題材。

北京電影製片廠門口，每天一早五、六點，就開始聚集各式各樣的人，這些人從八歲到八十歲的都有，他們全是在等片拍的臨時演員。這些所謂的「臨演」，並非演員專業，而是從四面八方前來討生活、碰運氣的人。早上八、九點的時候，能聚上七、八百人，就等片廠的人出來「挑貨」。「大部分的人都很流氣」，昌樺在試鏡會上觀察到這些臨演，懷抱夢想的少，懶惰投機的多。

一個雲南來的、姓謝的小伙子，在試鏡會上展露出與別人不同的特質。他直率、單純，對於表演有著不可救藥的狂熱，觸動了昌樺的好奇心。他想知道一個從南方來追尋理想的二十二歲青年，每天在片廠門口等待機會降臨的逐夢者，有著怎麼樣的生活。於是昌樺開始跟拍，紀錄他每天大多都只是在等待的日子。「我看到一個不斷在實踐自己的人，儘管他在等待。」昌樺說這年輕人每天都在看書，找人對戲練習，不時還「揣摩揣摩」某個主角的戲段演給昌樺看，如此的投入，充滿熱情。反觀自己，一個音像紀錄所、等著題材拍片的研究生，這樣的等待，如此虛無。

昌樺發現，自己的一切都建構在數位科技上，「相較於北京片廠的年輕人，我所做的一點也不實在」。回台後的他，除了繼續拍片、得獎，也打算計畫做一個裝置——由鐵絲捆成的人形，坐在打著白光的屋子裡。一張桌子上，有破的硬碟、壞的相機、斷掉的網路線。北漂回來的昌樺，更清楚自己的去向，他要繼續做自己的創作，用勞動來實踐理想。

果汁機攪了 78 天之後 廖博弘的大陸南北串走

文／廖博弘

第三屆流浪者廖博弘結束他的流浪者計畫後，旋即赴紐西蘭研習。本文為博弘八篇遊記中選取出來的兩篇，作為心得分享。

博弘的流浪路線：上海→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京→鄭州→西安→蘭州→嘉峪關→敦煌→上海



夏河甘加草原看馬／廖博弘提供

在蘭州人人都是審判官

「道德由個人自由判斷」，也就是說，遊戲規則我決定的算！因為「道德」，於是如此一句話的效力可以遠遠勝過於法律。

「腳踏車被偷就算了，要是也想偷回一台，想都不要想！西北人最痛恨的就是偷子！要是被別人看到你在偷車，你一定會被打死！」的士師傅說得義正嚴辭，眼珠子狠狠地瞪著我的雙眼，好似用力螺絲起子，扭進我的瞳孔深處。

師傅警告完之後，便撇過頭去，看著前方的道路繼續開車，我和師傅倆後來都不再說話，一直到了目的地，下車時我說：「師傅，你放心我不會偷的，謝謝師傅。」當時是在寧夏回族自治州——中衛市。爾後，我謹記著師傅的話，不敢造次，況且人生地不熟的...這樣最好吧，我本來就不應該冒這種風險，就算不騎腳踏車，我也能用雙腳走遍城市中的每個角落。

「蘭州都已經待了快一個禮拜，仗著體力，能走到的，我都走遍了吧！」走在蘭州的街道上，正想著還有哪條巷子能夠提起我的興趣時，前方巷子裡傳來一片猛烈的叫罵聲，我向前側身探出頭，好奇發生了什麼事，但一切發生的太快，來不及舉起我的相機，叫罵聲已經到了我的眼前。

眼前一片混亂，一群男人打赤膊用力地扭著一位男子上衣，連拖帶拉地把他揪著扭出街道上，還不時用拳頭揍在他瘦弱的身上，邊高喊：「偷子！有偷子！」，群眾此時像是抓了狂似的團團圍了過來，能踹上一腳的都使勁全力地踹，踢不到的人都遠遠地吐他口水，並舉起雙手不停地吆喝。這位瘦弱的男子挨不下去了，整個躺在地上試圖曲起身子，用背上一根一根明顯的肋骨抵擋，但這樣的意圖卻使得群眾的憤怒難以宣洩，他的腳立刻被群眾抓了起來，背部朝下被拖著過馬路，由於路面粗糙，摩擦將他的上衣整個褪去，街道上留下一條暗紅色將近 30 米的血肉模糊，然而遲遲不敢按下快門的我，早已被此場景震懾住。

還好，還好，那個觸犯遊戲規則的不是我...西北人最痛恨的就是偷子...

西北的地理環境，造就了西北人的強悍性格。外表看起來是中國人，骨子裡卻比西方人更是注重明辨是非，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但差別就在於，西方人憑的是「理」，靠的是「法」，而中

國人憑的是「情」，靠的是「義」。

正因為這個根本文化性的不同，有理硬是說不通，於是有所關係的要搞關係，沒關係的要拉關係，拉不到關係的要想辦法生出關係。這種事情無時無刻都在上演，如果有意欣賞如此獨特的文化特質，無須預約，無需費用，最好的觀賞地點就在各個城市人滿為患的火車站；如果有興趣進一步研究，還可以選擇任一條排滿人的售票窗口，試試跟著人群買票看看。

售票窗口的防彈玻璃

哈！終於有人忍不下去了！A 先生他站在售票窗口前，手指著前方的售票員破口大罵：「妳在搞什麼東西啊，剛剛那個人插隊，妳還賣他票，我這正當排隊的，妳不賣我票是什麼意思！」

售票員相當不客氣的說：「同志，這個閘道是出，那閘道才是進，我看你才是插隊的，想買票，沒門！後面的，買到哪！？」

我想，這樣的售票態度，任誰都很難忍受！

這時那位 A 先生更為生氣了，用拳頭槌向售票窗口的玻璃，力道很大，以致於遠隔著 7 個人的距離，都能聽到玻璃的「乒乒」聲：「妳這是什麼態度，我排隊排了這麼久，大家都是這樣排兩道！妳給我票來！」

嘩！就在這霎那間我這才驚醒——有哪個地方要用鐵的手腕才能建立秩序，決不是「不自由」、「沒人權」，反而恰恰是太過於自由、太過於專注人情仁義。

一直以來，總覺得中國怎麼這麼奇怪，為什麼這麼害怕，為什麼這麼封閉總是要把自己關起來，為什麼所有只要需要用到櫃檯的地方，只會在櫃檯台面上挖下一個類似老鼠洞的凹槽，一端通到櫃檯內，另一端通到櫃檯外，中間則是一道厚厚的防彈玻璃，或是一道頗有意味的鐵柵欄連上天花板。大陸唯一的外匯銀行——中國銀行，也不例外，第一次看到還以為是當舖呢，當然所有的交易都只能透過這個老鼠洞進行……原來這道柵欄關的不是售票員，而是購票人。

售票員超級火爆：「你給我出去，我不賣你票，走開，保全！」只見更為混亂的情況發生了，排在後面那位 B 先生瞬間向窗口擠了進去，對著窗口大喊：「到開封有沒有！？」A 先生，被擠得完全是爆發了：「喂！！我還沒買完，你插什麼隊！」售票員完全不理會 A 先生：「到開封，都沒位了，凌晨 2 點站票要不？」在更後面的 C 小姐 D 先生 E 先生 F 小姐 G 先生……等等，所有的人也順勢向前推進。

A 先生抵擋不住人潮，被推擠出閘道，永遠出局，再也無法靠近窗口。

衷心的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藝術人才飛翔的翅膀

二〇〇八年捐款者 (截至 2008/5/25)

林秋彥	150,000
聚業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邱甚翔	10,000
吳耿禎	3,000
黃功嵐	2,000
林瑞照	1,000
無名氏	1,000

二〇〇七年捐款者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1,000,000
沈悅	520,315
姚孟肇	100,000
無名氏	10,000
謝旺霖	3,000
吳欣澤	2,999
官振鴻	2,000
郭乃華	1,000
劉宛宜	1,000

二〇〇六年捐款者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官振鴻	2,000
郭乃華	1,000